



后石家河文化与石峁文化的互动*

——以玉人头像为中心

徐 峰

摘 要:后石家河文化的玉器传统很可能有着北方影响,玉人头像中的若干细节,包括“尖顶帽”、纹面、发型等特征辅证着这种北方影响。后石家河文化玉人头像的族属不是华夏族,而是北方早期游牧人的可能性是极大的。现有的不少考古资料表明石峁文化受到了游牧文化的影响。后石家河文化与石峁文化有着密切联系,有石峁遗址这一中国北方地区龙山时代晚期最大的城址,也是北方地区地缘政治的中心作为中介,后石家河文化传统中间接有北方草原文化因素渗入是完全可能的。后石家河文化中外来文化因素应该是多元的,来自北方草原的文化因素值得重视。后石家河文化与石峁文化的诸多相似,一方面见证了新石器时代末期的远距离文化互动,另一方面也为后石家河文化玉器寻找到了北方来源。

关键词:后石家河文化;玉人头像;石峁文化;文化互动

中图分类号:K8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4)05-0015-08

后石家河文化玉器向来是考古学界讨论的热点^①,尤其是近年来随着该文化一批新的玉器的出土,相关讨论更趋热烈。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后石家河文化玉器特征明显,器类丰富多样,标志性玉器突出。其中,玉人头像面貌奇特,引人注目。我们通过玉人头像,或能窥探到时代更替之际大范围、跨区域的文化互动与变迁。

一、玉人头像的基本面貌

目前所见后石家河文化玉器中的玉人头像材料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历年来的考古发现,出土玉人头像的遗址有湖北天门石家河、罗家柏岭、谭家岭、肖家屋脊,荆州枣林岗,钟祥六合

等^②;二是非科学考古出土,为海内外博物馆所收藏。后石家河文化玉人头像有很多流散在欧美地区博物馆,包括弗利尔美术馆、旧金山亚洲美术馆、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大英博物馆、西努齐博物馆,等等。

这类玉人头像大体可分成几个类型:正面像,杏眼,戴冠或头发竖起,有耳饰;正面像,杏眼,戴冠,有獠牙,两侧有翼饰,有耳饰;侧面人像,杏眼,头发竖起,耳鬓有长发飘于后,有耳饰。除了立体的玉人头像外,在若干种类玉器(如玉刀、玉圭)表面也有雕刻的人面纹。邓淑苹详尽地将之分成了两类三式七款^③。

不少学者对玉人头像的性质发表过看法。杨建芳认为这种人面并非某一时期及某一地区个别小人物(如酋长、巫师)的造型,而应是石家

收稿日期:2024-05-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长江下游社会复杂化及中原化进程研究”(20&ZD247)。

作者简介:徐峰,男,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 210023),主要从事区域文明起源、精神文化考古研究。

河文化居民及其后裔长期共同信奉的神祇或祖先崇拜的偶像^④。杜金鹏称它们为“玉雕人像”，认为其是用以表现神灵形象、用于神灵崇拜的玉雕品^⑤。邓淑苹称之为“神祖人面”^⑥。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学者多瑞文(Doris J.Dohrenwend)公布了一批欧美博物馆收藏的人首玉雕，形容其为“玉鬼神面(Jade Demonic Images)”^⑦。潘守永也沿用“玉鬼神面”这一称谓，并称其非源自动物面(或兽面)，而是源自人面。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神人”(或称“神”)，玉鬼神面表现的是“天帝”^⑧。林巳奈夫亦用神像称之^⑨。在立体的玉雕和玉器的表面反复表现一类人像(也包括对这类人像造型做进一步艺术的夸张、抽象和变形)，表明它们对创作者而言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反映了创作者对这类人像具有一定程度的信仰。因此，用“神像”来冠名这类玉人头像，无可非议。也不难看出，用“神像”或“玉鬼神面”来称呼这类玉器与人像的面貌奇异不无关系。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有一件玉人头像，大眼、高鼻(图1)。这件玉人头像显系后石家河文化玉器风格。潘其风认为其有胡人典型之高鼻深目特征^⑩。江伊莉、古方认为该人像面部特征更像尼格罗人种而不是蒙古人种，表现在宽大的鼻孔和大而圆的眼睛上，且年代应为龙山时代晚期，形制接近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的玉雕^⑪。殷志强对该人像之年代亦持同样见解^⑫。赵宏伟也注意到这类玉人和长江下游出土玉人面部的差异，首先反映的应是人种上的差异^⑬。由此看来，后石家河文化玉人头像的文化来源值得深思。



图1 后石家河文化玉人头像

二、玉人头像的几处细节特征

(一)尖顶帽

肖家屋脊遗址瓮棺 W6 随葬玉品质多达 56

件，其中玉人头像6件。W6:17玉人系侧面像，杏眼、高鼻，唇上有须且卷曲，有耳饰，耳鬓长发，头戴尖顶帽(图2)^⑭。众所周知，尖顶帽是极具民族标识性的文化标志。考古遗址中出土的与尖顶帽有关的图像或雕像，通常会引发与族属相关的讨论。比如，周原出土的两件西周蚌雕人头像皆为圆雕，系骨笄的帽部。头像为长脸、高鼻深目、窄面薄唇。人像头戴尖角状护耳翼的帽子，帽子顶部被切割掉。由于帽子有尖角状护耳翼，而且越向上越细，帽子上刻划着距离均等的竖线条，间距上窄下宽，推测是一种毛织的尖顶硬高帽。尹盛平认为，雕像的形貌毫无蒙古人种的特征，那种长脸、高鼻、深目、窄面、薄唇的形象，无疑与欧罗巴人种最为相似。蚌雕人像与居于西北地区的塞种有密切关系，表明公元前8世纪以前，中原已与西域(包括中亚一带)发生了文化接触^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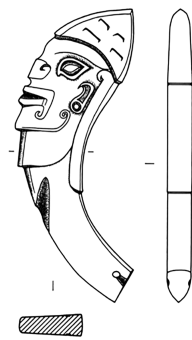


图2 肖家屋脊玉人头像侧面

饶宗颐^⑯、刘云辉^⑰、斯维至^⑱均认为此蚌雕与塞种有关。林梅村认为蚌雕帽顶横截面上刻的符号与阿富汗西伯尔罕黄金之丘遗址中一件剑鞘上的万字纹饰相同，并据此认为蚌雕应与月氏有关^⑲。梅维恒指出，人头雕像无疑具有高加索或欧罗巴人种特征，并将蚌雕的族属联系到安德罗诺沃(Andronovo)文化^⑳。水涛也认为该雕像面貌应为西方人种，但究竟为何种西方人种族类型，可以讨论。水涛表示，中亚许多古代民族的服饰都很相近，戴有帽子的也并非仅尖帽塞克一支。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在体质类型上属于欧罗巴人的文化遗存理解为广义意义上的塞种，以示其和华夏族的区别，这是可以说得通的^㉑。

在这些学者的讨论中，尖顶帽是辨别族属

非常重要的文化标志,尽管观点细节还有差异,但相同的是他们都没有将蚌雕人像与华夏族联系起来。邢义田曾经指出,在战国时期,尖顶帽在中原工匠手中,已逐渐成为一种刻画北方草原游牧民的形像符号,有固定化、模式化的趋势。自战国到汉代所想象和描绘的北方草原游牧民,其形像存在空间上极为辽阔、时间上极为悠远的渊源^②。而在近东地区,尤其是叙利亚,戴尖顶帽的人物早在公元前2600—公元前2300年间就已经出现,绝大多数来自近东、中亚地区的“胡人”都以戴尖顶帽为特征^③。

那么,这件后石家河文化中戴尖顶帽的玉人头像非华夏族吗?也许仅凭这一证据,尚难下此结论。但是我们必须慎重看待这一文化标志。来自三星堆的一项最新证据也有助于此处

的讨论。三号坑中出土一件立人铜像所戴尖顶帽,是颇为典型的尖顶帽。三星堆铜人像面部风格和后石家河玉人头像颇有相似处,两支文化之间的关联,早有学者指出过^④。三星堆的最新发现进一步证明了两者的联系。看来,后石家河文化的尖顶帽不是孤例,此一标志不容忽视,很可能反映了一些族属问题。

(二) 发型、纹面、胡须

肖家屋脊侧面玉人像(W6:17)、河南光山县宝相寺黄君孟墓出土的蜷曲侧面人首(图3)^⑤、谭家岭遗址人头像(W9:6)(图4)^⑥,以及法国西努齐博物馆藏侧身蹲踞式人像等多件玉人头像的发型都极有特色,表现为耳鬓有一络边发,头顶部位头发竖起,四周则剃光,这样的例子非常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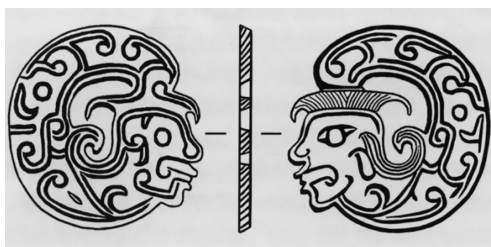


图3 人首蛇身环形饰



图4 谭家岭人头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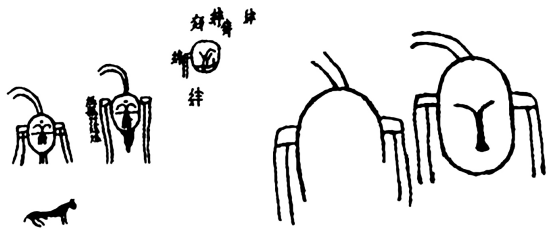


图5 贺兰山岩画中的人面像

与尖顶帽一样,发型、衣饰皆为古代民族的文化标志。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1]孔子用“被发左衽”来概括当时戎狄的外貌和服饰特征,与传统华夏族的发型完全不同。在中国历史上,羌人、鲜卑人、党项人、契丹人等游牧民族的发型就有披发、秃发、辫发、髻发等。宁夏贺兰山岩画中的图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参考。如图5所见,头顶有发,四周剃除,双耳部位各有两络下垂的头发^⑦,与后石家河文化玉人头像的发型非常相似。这类秃发风格的人面岩画出现在西夏统治区的核心范围内,显然是鲜卑党项人的作品,时代约与中原的汉至两宋年代相当^⑧。这种发型的一大特点就是两鬓各有一络头发垂于耳旁。此处的比较尽管不是共时性的,但重要之处在于,和尖顶帽一样,这种发式也是一种明显的民族标志。传统华夏族非此发式,这种发式多见于北方游牧人群。

后石家河文化玉人头像还有一个颇具族属

特征的标志不可忽视,即脸部的纹面。上海博物馆藏后石家河文化风格的玉刀柄端处浅浮雕了侧面人像,其面颊上有清晰可见的纹面^⑨。甘肃灵台白草坡出土的“鸟人纹”玉笄人像(此件虽出土于西周墓葬,然亦具有后石家河文化玉器传统)脸颊上(图6)^⑩、肖家屋脊遗址玉人头像(W6:17)脸颊偏下位置都有纹面,等等。在脸上进行纹面或刺青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古老习俗,在华南及沿太平洋一带尤为盛行。古代中国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如戎狄、匈奴等亦有此俗,而就考古图像资料来观察,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纹面习俗可能与其西北方的内陆欧亚地区的习俗有关。陈健文曾列举了大量中国北方、西北方,中亚与南俄地区古代文物中的纹面图像,发现他们脸上的卷云状图案有一致性,这或许是一种源自内亚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时期的印欧古老习俗。陈健文认为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所藏后石家河文化风格的玉人头像面部的卷云状(图1)也是纹面^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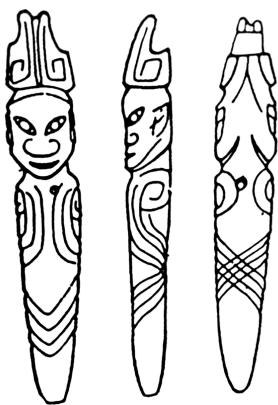


图6 西周早期“鸟人纹”玉笄

甘肃灵台白草坡玉笄人像所属的考古学情境对此处的讨论也有帮助。同墓中出土一件人头釜钩戟,人头浓眉巨目,披发卷须,腮部有纹面,形貌具有欧罗巴人种的特征^⑧。这一证据表明西周王朝西部的一些方国与欧亚草原和近东有一定的文化联系,不仅有武器传入,可能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人员交往^⑨。邓淑苹认为白草坡玉笄人像虽不排除是商晚期的作品,但其造型则确实传承自古老的肖家屋脊传统,而这件铜器人头像则是她所分的肖家屋脊文化中戊式神祖的后续发展。同时她又引述其他学者的看法认为该人像是白种人^⑩。

此外,上述肖家屋脊 W6:17 侧面人像有须(图2),两侧卷曲,很有几分胡人胡须的味道。丝绸之路草原的石人,唇部的胡须多呈“一”字形,两侧略微卷曲,与之类似^⑪。玉人头像的鼻子也是高挺勾曲的,谭家岭遗址连体双人头像(W9:2)^⑫所见尤为明显。

综合以上几点讨论来看,后石家河文化玉人头像的族属不是华夏族,是北方早期游牧人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三、石峁新发现的启示

石峁城址是中国北方地区龙山时代晚期至夏文化早期的超大型中心聚落。最近,考古材料又显示出石峁文化与后石家河文化之间的联系。这些新发现为后石家河文化玉人头像的族属问题提供了进一步的启示。

在石峁城址最新的考古发现中,有若干件石雕图像格外引人注目。最新公布的大台基南

护墙中部墙体倒塌堆积中的41号石雕为长条形,表面有减地浮雕,图像中间为正视的人头像。斗顶平整,额顶雕出细密的发隙,似为头发后拢形成,两侧束发下垂至双颊,并向外翻卷^⑬。28号石雕出土于大台基南护墙东部墙体的倒塌堆积中。石雕呈长方形,图像为侧视人头像,细线阴刻。人面向左,头顶平直,前后两端均向外尖凸,似为发型,斜“臣”字眼,鼻头较大,鼻脊高挺,鼻翼圆卷,张嘴,长耳下坠圆形耳珥。颈部细长,其下有横划纹,似为项圈类饰物^⑭。该人头像与后石家河文化玉人像极为相似。

石峁石雕人像的眼睛、鼻子、耳饰、披发以及整体形貌与后石家河文化玉人头像都趋于一致。此外,大台基南护墙47号石雕人像的双颊上也有可能是表现纹面的雕刻(图7)。石峁遗址的发掘者已经明确提出这些石雕风格可能影响了后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夏代的绿松石“龙”,甚至商周青铜礼器的艺术构思和纹饰风格^⑮。47号石雕人像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它是两面对称雕刻,像是看向相反方向的“两面神”。谭家岭遗址出土的连体双人头像恰恰也是朝向不同的方向。



图7 石峁皇城台大台基南护墙47号石雕

除了石峁遗址新近出土的石雕人像外,榆林上郡博物馆里也收藏有石雕人头像(图8)。该石雕人头像为三角形,平顶齐眉,眉与隆鼻连为一体;阔嘴无颈,两腮外鼓,下巴与底部平齐;柳叶形大眼延伸至耳后,造型极为夸张;立体高浮雕,雕刻手法简约、粗犷。谭家岭遗址出土一



图8 榆林上郡博物馆藏石雕人头像

件人头像(W9:28)^④,与之有着惊人的相似,尤其是柳叶形眼睛。

石峁的24、41号石雕上可见明确的虎-人-虎的图像^④,这种a-b-a结构关系在谭家岭遗址的虎脸座双鹰(W8:13)^④上也能看到。此外,石峁的对虎与中间人头的关系也可以与后石家河文化玉器中的鹰人关系(如上海博物馆藏鹰攫人首玉雕)相提并论。笔者曾经指出,鹰攫人首的主题结构与文化内涵同青铜器虎食人首是一致的。鹰爪和猛虎口下的人首,初观多以为是表现猛禽或猛兽对人类的侵犯。但在萨满教传统中,鹰与虎多扮演“辅助神灵(helping spirits)”的角色,尤其流行于北方草原文化中^⑤。现在又多了一个类似的石峁石雕的例子,可知这类传统渊源有自。

以虎和鹰为造型的雕像、陶器在石峁遗址与后石家河文化遗址中都有发现。目前石峁遗址的虎形象发现在石雕之上,后石家河文化玉器中的玉虎造型则可以分为写实虎、长方形虎头像和管状虎头像三型。写实虎为侧身像,展示出虎伸展的身躯(谭家岭W9:44^④),与石峁遗址虎造型中的虎形象颇类似。另外,在石峁也曾收集到一件短管状的玉虎头^⑥。

至于鹰的形象,石峁遗址近年出土了大量陶片,考古工作者目前已经拼出了二十多个陶鹰^⑥。而在后石家河文化中,鹰的形象非常有特色。国内外博物馆收藏的属于后石家河文化的鹰攫人首玉雕有多件,谭家岭遗址出土的虎脸座双鹰、玉鹰(W9:3)、鹰形纹圆牌(W8:34、40),还有鹰纹玉笄(石峁也曾征集到鹰纹玉笄)等也都很有特点。放眼同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玉器,对鹰形象的丰富表现,以后石家河文化为最。鹰攫人首、兽面(人面)纹、鹰纹以及虎纹是后石家河文化玉器上的典型纹饰。

如果要问鹰这种猛禽在哪个区域的自然和历史文化传统中有着深刻的印迹,那么北方草原一定当仁不让。鹰是草原地带常见的猛禽,和游牧文化关系密切。中国历史上的北方草原民族将鹰视为偶像和图腾崇拜,在西伯利亚地区更是如此,在当地的民族志材料中,鹰和萨满之间有神秘的关系。鹰被认为是第一个萨满的父亲,在萨满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

角色。鹰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至高无上的存在^⑦。尚永琪曾经指出,鹰是草原民族心中的神鸟,更是欧亚大陆古代皇室和王族所青睐的神秘力量的象征。鹰隼也是战争的参与者,欧亚文明历史图像中有不少鹰隼攻击人的实例^⑧。在北方草原的考古材料中,鹰抓动物(如牡鹿)的图像很常见,鹰栖在人的肩上、头上的图像也很多。有了草原地区鹰崇拜的这些知识传统,再来看后石家河文化的鹰攫人首,认为它们与草原文化有关不但不突兀,还很契合。再如谭家岭遗址近年新出的鹰形纹圆牌(W8:34、40)^④,为单面浅浮雕鹰的图像。这类圆牌必然是上等身份地位的人才拥有的,是神圣的象征。这件鹰形纹圆牌颇似后世的“符”。比如,古代蒙古社会就曾制作“海青符”——一种刻有雄鹰海东青的牌符,象征着可汗亲临,因而持此符者权力巨大,反映出海东青神圣而至高无上的地位^⑨。

石峁遗址位于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也是欧亚草原与黄河流域之间文化传播的中间地带。现有的不少考古资料表明石峁文化受到了游牧文化的影响,石峁遗址出土了不少石人头像。郭物指出:“石峁遗址所出的石人的确和奥库涅夫文化和切木尔切克文化的石人有相似之处,因此,石峁遗址出土的这些石人有可能和其西北部的文化有关系。”^[2]李旻认为石峁发现的人头石雕、坐像、岩画、货贝、绿松石珠、鸵鸟蛋壳、铜齿环以及大量散布的打制石器揭示了高地社会与北亚、中亚互动网络之间的联系^⑩。王鹏也认为奥库涅夫文化对石峁文化有很多影响^⑪。杨伯达推测石峁的玉料来源较为多元,甚至可能有来自今俄罗斯境内东萨彦岭的玉料^⑫。罗森也支持石峁文化受到北方草原文化影响的观点^⑬。

根据以上讨论再回看后石家河文化,认为人首玉雕的背后有来自草原文化的影响就不那么突兀了。倘若没有石峁遗址近年来一系列新的发现,北方草原与后石家河文化所在的江汉平原毕竟空间上相距太远,其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就非常小。现在有石峁遗址这一中国北方地区龙山时代晚期最大的城址,也是北方地区地缘政治的中心作为中介^⑭,后石家河文化传统中间接有北方草原文化因素渗入成为可能。2008

年,浙川下王岗遗址灰坑 2008T2H181 中出土了 4 件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也为这一远距离互动提供了一个地理参照。铜矛的年代介于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时期某一个阶段。高江涛认为,不排除齐家文化通过丹江上游东龙山文化影响到丹浙流域的下王岗遗址。下王岗和齐家文化恰恰都发现了此类形制相同的铜矛,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下王岗铜矛与这一现象有着一定的联系,因此我们推测下王岗遗址出土铜矛的年代应该属于下王岗遗址龙山文化末期^⑤。按照这样的推断,我们可以将这四件铜矛视作西北地区考古学文化和游牧文化交流碰撞之后产生的一个文化因素。而铜矛所在的下王岗遗址正是丹浙之会,往南便是江汉地区。邵晶指出,石峁文化与后石家河文化存在远程交流,其路线或为河套地区—关中地区—南阳盆地—江汉平原间的“走廊”地带^⑥。这一南北交通互动路线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即已形成。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韩建业认为石峁人群的族属是北狄^⑦。我们知道,东周时期华夏人群与狄人有了冲突,所以孔子曾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表明当时北方游牧民的发型和华夏人群是不一样的。如果石峁人群是北狄的话,恰与石峁、后石家河文化石雕、玉雕所见人像的风格是一致的。而且,狄人生活在今长城沿线,自然与北方草原人群会有较多的接触。和石峁有文化交往的齐家文化也是如此。胡博(Louisa G.Fitzgerald-Huber)曾经指出,齐家文化里有许多显示外来源头的文化面貌,而与这些面貌最接近的,是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⑧。

结 语

龙山文化晚期,区域之间的文化互动与接触频繁,不同人群间的战争不断加剧,城址大规模涌现,聚落、墓葬等级分化。很多区域诞生了具有政治、宗教和经济功能的中心。按照中国古代文献的记载,这一时期可谓“万国”林立。考古学界目前认为后石家河文化的年代是公元前 2200 年至公元前 1800 年^⑨。石峁城址初建于公元前 2300 年前后,废弃于公元前 1800 年

前后^⑩。齐家文化的年代上限可在四千多年前,下限则进入夏代纪年。陶寺遗址绝对年代为公元前 2300 年至公元前 1900 年^⑪。按照这个时间数据来看,后石家河、石峁、齐家文化曾经有过时间交集。考古发现也表明这几支考古学文化间有文化因素的远距离交换。

超出我们想象的是,后石家河文化玉人头像也有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的影响。如果没有石峁的考古发现,后石家河文化所在区域与北方草原在空间上确实相距遥远。但是现在有了石峁作为中间媒介,对二者之间存在文化交流就不难理解了。或者可以这么认为,后石家河文化与石峁文化有着密切联系。这个认识是与当前考古学界关于石家河文化晚期文化内涵出现较大变化这一认识相吻合的^⑫。比如,杨建芳结合古史中“窜三苗于三危”来解读石家河文化内涵发生变异,认为有外来文化因素的进入^⑬。朱乃诚指出,石家河文化晚期的一批玉器不具有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传统,如玉雕神人头像、虎头像、鹰或飞鹰,等等。这种礼仪性玉器似乎是在石家河文化晚期突然在长江中游地区出现的^⑭。石家河文化晚期的陶器与早中期的陶器相比也有明显变化^⑮。杜金鹏谈及石家河文化玉雕神像时说:“我们首先应到屈家岭文化中去追寻石家河文化玉神像的源头。据知,屈家岭文化出土玉器很少,现已公布的主要是京山屈家岭遗址出土的一部分玉器,但其中没有玉神像。所以,我们不能认为石家河文化玉神像与屈家岭文化玉器有承传关系,但现在做出完全相反的判断也还为时过早。”^[3]

本文所论显然是可以隶属于石家河文化晚期文化传统有大的变迁这一认识框架内的。考古学界一般认为,以王湾三期文化为代表的中原龙山文化由豫西南的南阳盆地至丹江下游经汉水入长江,为江汉地区带去了先进的文化因素^⑯。也有的学者认为后石家河文化的玉器传统来自山东。现在看来,这类外来文化因素很可能是多元的,来自北方草原的文化因素值得重视。石峁文化与后石家河文化面貌的相似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两者相似的图像形态而言,石峁石雕上纹样的幅面巨大,是具有公众性的一类纹饰^⑰,用料较巨;而后家河文化玉器器形

小,位于瓮棺之中,不具有公共性。面貌是相似的,背景却有差异,这恰恰暗示可能是远距离文化互动过程中文化变易所致。

后石家河文化与石峁文化的诸多相似性一方面见证了新石器时代末期的远距离文化互动,另一方面也为后石家河文化玉器特征寻找到了北方来源。石峁文化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它应该与北方草原人群有着文化互动。这就相应解释了为什么后石家河文化玉器中会存在北方草原文化因素。这也提醒我们要从世界体系或者欧亚大陆体系的视角来认识石峁文化与东西方的文化交互。公元前二千纪前后,东、西、南、北文化互动进程不断加快,很多外来的文化因素在西北地区出现了。这种文化交互由外而内(同时也由内而外)渐次传递,进入史前中国境内后,呈现出复杂、多元的面貌。当我们对史前中国有了更广阔的视界之后,我们对早期文明的很多看法也会随之改变。

注释

①关于“后石家河文化”或“肖家屋脊文化”的名称问题,见孟华平:《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结构》,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34页;王劲:《后石家河文化定名的思考》,《江汉考古》2007年第1期;何弩:《试论肖家屋脊文化及其相关问题》,《三代考古》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8—145页。②荆州博物馆:《石家河文化玉器》,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家河遗址2015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江汉考古》2016年第1期。③④邓淑苹:《新石器时代神祖面纹研究》,载杨晶、蒋卫东执行主编:《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五)》,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66—267页。④杨建芳:《大溪文化玉器渊源探索——兼论有关新石器时代文化传播、影响的研究方法》,载《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⑤杜金鹏:《石家河文化玉雕神像浅说》,《江汉考古》1993年第3期。⑥邓淑苹:《雕有神祖面纹与相关纹饰的有刃玉器》,载山东大学考古学系编:《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⑦Doris J.Dohrenwend,“Jade Demonic Images from Early China,” *Ars Orientalis*, Vol.10 (1975):55—78。⑧潘守永、雷虹霁:《“玉鬼神面”的文化意蕴》,《民族艺术》1999年第4期。⑨[日]林巳奈夫著、常耀华等译:《神与兽的纹样学——中国古代诸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65—90

页。⑩潘其风:《中国古代人种》,《历史月刊》(台湾)1990年第24期。⑪江伊莉、古方:《玉器时代:美国博物馆藏中国早期玉器》,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页。⑫殷志强:《旅美华玉——美国藏中国古玉珍品》,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0页。⑬赵宏伟:《长江中、下游史前玉人的比较》,《东南文化》2002年第4期。⑭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317页。⑮尹盛平:《西周蚌雕人头像种族探索》,《文物》1986年第1期。⑯饶宗颐:《丝绸之路引起的“文字起源”问题》,《明报月刊》(香港)1990年第9期。⑰刘云辉:《周原出土的蚌雕人头像考》,载《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6—491页。⑱斯维至:《从周原出土蚌雕人头像谈严允文化的一些问题》,《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⑲林梅村:《开拓丝绸之路的先驱——吐火罗人》,《文物》1989年第1期。⑳Victor H. Mair, Old Sinitic Myag, “Old Persian Maguš and English ‘Magician’,” *Early China*, no.15 (1990):27—48。㉑水涛:《从周原出土蚌雕人头像看塞人东进诸问题》,载《远望集》(上),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373—377页。㉒邢义田:《立体的历史:从图像看古代中国与域外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25、132页。㉓㉔王辉:《甘肃发现的两周时期的“胡人”形象》,《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6期。㉕裘士京、陈震:《三星堆青铜头像和石家河玉面人像——从三星堆青铜头像看三星堆文化的来源》,《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㉖河南信阳地区文管会等:《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考古》1984年第4期。㉗㉘㉙㉚㉛㉜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天门市博物馆编著:《石家河遗珍:谭家岭出土玉器精粹》,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0页,第15页,第12页,第52页,第40页,第59页、第60页。㉝许成、卫忠编著:《贺兰山岩画》,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第84—85页。㉞朱利峰:《环太平洋视域下的中国北方人面岩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8页。㉟张尉:《中国古代玉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1页。㊱㊲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㊳陈健文:《从文面图像看内亚高加索游牧民族与华夏的早期接触》,《故宫学术季刊》(台湾)2011年第2期。㊴王博、祁小山:《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㊵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市石峁遗址管理处:《陕西神木市石峁遗址皇城台大台基遗迹》,《考古》2020年第7期。㊷㊸㊹孙周勇、邵晶、邸楠:《石峁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述》,《中原文物》2020年第1期。㊺徐峰:《从形制

与纹饰看玉器和青铜器之间的文化传承》,《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5期。④④杨建芳:《“甯三苗于三危”的考古学研究》,《东南文化》1998年第2期。④⑥孙周勇、邵晶、邱楠等:《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20年2月7日。④⑦ Mircea Eliade, *Shamanism: Archaic Techniques of Ecstasy*,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Willard R. Trask, London: Arkana, 1989, p.158. ④⑧尚永琪:《欧亚文明中的鹰隼文化与古代王权象征》,《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④⑩尚永琪:《海青冠演变为朱雀冠的图像学解释》,《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5日。④⑪李旻:《重返夏墟:社会记忆与经典的发生》,《考古学报》2017年第3期。④⑫与王鹏会议交流,奥库涅夫文化与石峁遗址诸多考古发现相似,参见:Ю.Н.Есин, *Древнее искусство Сибири: самусь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Томск, 2009. ④⑬杨伯达:《“一目国”玉人面考——兼论石峁玉器与贝加尔湖周边玉资源的关系》,《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2期。④⑭ J.Rawson, “Shimao and Erlitou: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origins of the bronze industry in central China,” *Antiquity* 91, 2017. ④⑮孙周勇:《公元前第三千纪北方地区社会复杂化过程考察——以榆林地区考古资料为中心》,《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4期。④⑯高江涛:《试论中国境内出土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南方文物》2015年第4期。④⑰邵晶:《论石峁文化与后石家河文化的远程交流——从牙璋、鹰笄、虎头等玉器说起》,《中原文物》2021年第3期。④⑱韩建业:《“石峁人”或属北狄先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2月27日。④⑲胡博:《齐家与二里头:远距离文化互动的讨论》,载夏含夷主编:

《远方的时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54页。④⑳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天门市博物馆:《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2014—2016年的勘探与发掘》,《考古》2017年第7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文物局:《湖南澧县孙家岗遗址2016年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8年第3期。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㉒张绪球:《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309页;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347页。㉓朱乃诚:《论肖家屋脊玉盘龙的年代及有关问题》,《文物》2008年第7期。㉔张绪球:《石家河文化的分期分布和类型》,《考古学报》1991年第4期;韩建业、杨新改:《王湾三期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7年第1期。㉕王劲:《后石家河文化定名的思考》,《江汉考古》2007年第1期。㉖陈小三:《石峁皇城台石雕的几点认识》,《考古与文物》2022年第2期。

参考文献

- [1]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5457.
- [2]郭物.从石峁遗址的石人看龙山时代晚期中国北方同欧亚草原的交流[M]//早期丝绸之路暨早期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64.
- [3]杜金鹏.石家河文化玉雕神像浅说[J].江汉考古,1993(3):53.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ost-Shijiahe Culture and the Shimao Culture —Centering on the Jade Human Head

Xu Feng

Abstract: The jade ware tradition of the post-Shijiahe culture reflects a possible influence from the north, as indicated by some details in the jade figures' heads, such as “pointed hats”, patterns on faces and hairstyles. It is plausible that the ethnic group of jade human heads in the post-Shijiahe culture was early nomads in the north rather than Huaxia. The existing archaeological data show that Shimao culture was influenced by nomadic culture. Post-Shijiahe culture was closely related to Shimao culture. Given Shimao Site, the largest city site of late Longshan period in northern China, served as the geopolitical center of northern China as an intermediary, it is entirely possible that the cultural traditions of post-Shijiahe culture was indirectly influenced by the northern steppe culture. The foreign cultural factors in post-Shijiahe culture were likely diverse, so the northern steppe ones deserve attention.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Shimao culture and the post-Shijiahe culture show the distant cultural interaction at the end of the Neolithic Age, and highlight the northern origin of the jade ware of the post-Shijiahe culture.

Key Words: post-Shijiahe culture; jade figure head; Shimao culture; cultural interaction

[责任编辑/启 轩]